

# 略论建立汉文佛教文献学的必要性

冯国栋

(浙江大学 古籍研究所,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 在汉文佛教文献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有必要建立一门专门研究汉文佛教文献的学科,即汉文佛教文献学。汉文佛教文献学是以汉文佛教文献及佛教文献工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佛教文献产生、发展、整理、存藏、传播、利用的历史和规律,并为佛教文献工作提供理论指导的专科文献学。汉文佛教文献学与汉文佛教史科学、汉文佛教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欧美佛教文献学方法不适用于汉文佛教文献,而汉文佛教文献学与中国传统文献学又有诸多不同。另外,汉文佛教文献在整个中国文献学史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因而有必要建立汉文佛教文献学。

[关键词] 汉文佛教; 文献学; 可能性; 必要性

##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Necessity to Establish the Chinese Buddhism Philology

Feng Guodong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ncient Book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Buddhism literature,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the subject by which Chinese Buddhism literature is dealt with, namely Chinese Buddhism philology. The Chinese Buddhism philology, taking the Chinese Buddhism literature and the work of Buddhism literature as the object, studies the history and rules about Buddhism literature and provides the theories for the work of Chinese Buddhism literature. The Chinese Buddhism philology is different from the study on Chinese Buddhism historical data, the reorganization and the research on the Chinese Buddhism literature. On the other hand, it has many relations with the latter two. There are three reasons to establish the Chinese Buddhism philology: First, the western methods of Buddhism philology are not suitable for the Chinese Buddhism literature. Second, there are many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hinese Buddhism philology and the common philology. Finally, the Chinese Buddhism literature is important in the entir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hilology.

**Key words:** Chinese Buddhism; philology; possibility; necessity

[收稿日期] 2009-05-19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 2009-10-13

[基金项目]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项目(08CGWX001Z)

[作者简介] 冯国栋,男,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汉文佛教文献学、汉文佛教文献研究。

中国著名佛教文献研究专家方广锬先生回顾近四十年的佛教研究时曾言：“佛教文献学包括佛教文献学本身的理论建设与学科建设，经录、藏经的研究以及佛教典籍的收集整理，大藏经的编纂及其电子化。目前，我国佛教文献学的工作主要还是后二者。”<sup>[1]</sup><sup>66</sup> 诚哉斯言，建国以来我国在佛教文献的搜集、整理、研究诸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对于佛教文献学本身的学科体系、对象、性质、特点之探研则寥若晨星<sup>①</sup>，究竟何为汉文佛教文献学，是否有必要建立此门学科，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笔者不揣谫陋，略书浅见，以求正于方家通人。

## 一、汉文佛教文献与汉文佛教文献学

### (一) 汉文佛教文献与汉文佛教文献群

笔者在《汉文佛教文献学体系构想》一文中提出：所谓汉文佛教文献是指用汉文撰录的、关于佛教知识的、并与某种特定载体相结合的图书或其他资料<sup>②</sup>。此定义中应注意者有如下四端：第一，汉文佛教文献是用汉文撰录、以汉字记载的佛教文献，故不包括用梵、巴、藏、蒙等其他文字撰录的佛教经籍。第二，汉文佛教文献既包括中国僧俗翻译、撰著的佛教文献，亦包括日本、韩国、越南等汉文化圈中僧俗人士所撰著的佛教文献。第三，汉文佛教文献是关于佛教知识的文献，这是其不言自明的题中之义，故而与佛教知识无关的文献不在讨论之列。第四，载体的广泛性。凡是用汉文撰录的关于佛教知识的文献，不论其与何种载体结合，皆为汉文佛教文献。故汉文佛教文献既包括传统载体如纸、金石等形式，亦包括现代载体如磁盘、光盘等形式<sup>[2]</sup><sup>35-56</sup>。

文献群是指具有某些相同特征的一组或一群文献，汉文佛教文献群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加以分类：

第一，根据是否入藏，可分为藏经文献群与藏外文献群。藏经文献群是指为历代汉文大藏经所收录的经、律、论、著述；而藏外文献群是指不为历代汉文大藏经收录而独立流传的佛教文献<sup>③</sup>。藏经文献群和藏外文献群常常处于不断变动与相互转化的过程中。如早期汉文大藏仅收录翻译的经、律、论，而不收中土僧俗所撰写的著作，而后期的大藏则普遍收录有中土僧俗所撰如目录、音义、史传等明教弘道之作。历史上大藏的结集，经常有一部分藏外文献变为藏经文献，也经常有一部分藏经文献转变为藏外文献。同时，随时代发展，新的藏外文献又会不断产生，从而推动新大藏经的编修，而新大藏经的出现又使得部分藏外文献变为藏经文献。

第二，根据文献的产生方式，可分为翻译佛教文献群与撰述佛教文献群。翻译佛教文献群是指由梵、巴、藏、中亚古语等翻译而成的汉文佛教文献；而撰述佛教文献群则是指由汉文化圈中僧俗人士独立撰写的注疏、传记、目录等著作。

第三，根据文献的流传方式，可分为传世佛教文献群与出土佛教文献群。传世佛教文献群

① 笔者仅见严耀中先生《试论宗教文献学》，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第115-119页。此文对宗教文献的定义、研究对象、宗教文献的解读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看法。

② 近代以来对“文献”这一名词之理解和解释多种多样，概而言之，则有文史学界与情报图书馆学界两大阵营。文史学界的文献概念一般是指用文字记录的图书或资料，可称为“狭义的文献”；而图书馆学界文献概念则宽泛得多，如1985年国家标准局批准发布的GB4894—85《情报与文献工作词汇——基本术语》规定：“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不仅把文字记载的图书等文献包括在内，还包括录音、图像等文献，可称为“广义的文献”。笔者此处则取狭义文献之义，之所以如此，乃基于如下考虑：广义的文献概念固然有利于扩展文献研究的范围，然外延过于广大，对于一门学科来讲，则不利于总结规律。因为外延越大，例外越多，规律的普适性越差。因而对研究对象进行适当的封闭，对建立比较科学的体系是有益的。

③ 蓝吉富先生将藏外文献分为狭义藏外文献和广义藏外文献，前者是指佛教徒研究或弘法的著述，后者是指散布于世典中的文献，如正史、小说、类书中的佛教文献。参见蓝吉富《佛教史科学》，(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274页。

是指成文后一直不断流传的佛教文献；出土佛教文献群则是指由地下发掘的古代佛教文献。两者之间也存在互相转化的关系：传世佛教文献会因种种原因而转变为出土佛教文献，如敦煌藏经洞中的佛教文献；同时，出土文献如果与其载体、书写方式相分离，而与其他载体结合，也会转化为传世佛教文献，如敦煌藏经洞中的佛教目录文献被录文整理、印刷出版为《敦煌佛教经录辑校》，出土文献就转化为传世文献。

第四，根据国别的不同，可分为域内佛教文献群与域外佛教文献群。域内佛教文献群是指由中国僧俗翻译撰写并流传于中国境内的汉文佛教文献；而域外佛教文献则指汉文化圈中其他国家僧俗用汉文翻译或撰写的佛教文献，也指由中土僧俗翻译撰写而流传于汉文化圈其他国家中的佛教文献<sup>①</sup>。两者之间也存在相互转化的关系。以五代宋初天台教典回归中土为例，天台教典本为中土僧俗所撰述，后因战乱、毁佛运动不传于域内，而在韩、日等国却得以保存，此时域内文献转化为域外文献。而经吴越钱氏的努力，这些典籍又回流中土，域外文献又转变为域内文献。

第五，根据时代的不同，又可分为古代佛教文献群与近现代佛教文献群。这两类文献群之间的差别主要在于载体、印写方式和著作形式的不同。如古代文献的载体多为纸、金石，印写方式主要为抄写或雕版；而近现代佛教文献载体则呈现出多样化特点，增加了光电等新载体，印写方式也发展为铅字印刷、激光照排等。从著作形式上讲，近现代出现了诸如佛教教科书、百科全书、论著、辞典等新形式。

## （二）汉文佛教文献学

汉文佛教文献学是以汉文佛教文献及佛教文献工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佛教文献产生、发展、整理、存藏、传播、利用的历史和规律，并为佛教文献工作提供理论指导的专科文献学。

为了更好地理解汉文佛教文献学，辨明汉文佛教文献学与汉文佛教史科学、汉文佛教文献整理和研究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是非常必要的。

### 1. 汉文佛教文献学与汉文佛教史科学

汉文佛教文献学与汉文佛教史科学虽同属汉文佛教研究的基础学科，但在研究范围、内容、目的方面存在差异。

首先，两者研究的范围不同，佛教史科学大于佛教文献学。史科学以史料为研究对象，史料包括三类，即文字史料、实物史料（古遗址、古遗迹、古建筑、古器物）、口传史料（历史传说、史诗）<sup>②</sup>；而文献则是史料中文字史料的部分。如佛牙、舍利、石窟、寺塔、佛像、佛教壁画、僧侣日常用具等属于实物史料，是史科学研究的对象，但却不属于文献的范围。蓝吉富先生《佛教史科学》第六章设有《遗迹与遗物——非文字史料》一节，正可说明佛教史科学的研究对象要比佛教文献学更为宽广。

其次，两者研究的内容和目的相异。史科学的内容主要有二：一是鉴别史料的方法；二是按时代、主题等介绍相关史料。而文献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文献的载体、文献群的产生和发展、文献整理的方法及文献学的历史。文献学的目的在于探寻文献发展与文献整理的规律，以指导文献的研究和整理；而史科学在于介绍、鉴别史料，为进一步研究服务。文献学着眼于文献的整理；史科学着眼于史料的搜集、鉴别及其价值评判。佛教文献学与佛教史科学虽皆属实践性较强的学科，但佛教

<sup>①</sup> 张伯伟师将域外汉籍分为三种：历史上域外文人用汉文书写的典籍、中国典籍的域外刊本或抄本、流失在域外的中国古籍（包括残卷），域外汉籍的主体是第一类文献。参见张伯伟《域外汉籍研究答客问》，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139页。

<sup>②</sup> 近来又有学者提出“网络史料”的概念，参见陈述《网络史料的优势及应用方式》，载《河北学刊》2007年第2期，第96-97页。

史科学更强调实用性<sup>①</sup>。

## 2. 汉文佛教文献学与汉文佛教文献整理、研究

佛教文献学是以佛教文献群、佛教文献整理研究工作及其历史为研究对象,抽象归纳佛教文献研究中的方法、规律、思想,并用于指导佛教文献整理与研究的一门学科。而佛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则以具体的、单一的佛教文献为研究对象,运用佛教文献学的方法,对佛教文献进行辨伪、注释、校勘、辑佚、标点等具体工作。佛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是佛教文献学的基础,而佛教文献学则是指导佛教文献研究的一门学科。两者紧密联系,但又各自有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

文献整理、研究与文献学的区别,举例来说,陈垣先生对《元典章》的校勘属于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其成果是“得谬误一万二千余条”;而在此基础上写就《校勘学释例》、总结校勘四法等规律,则属于文献学的范畴。再如清代对古书辨伪的实践为文献整理与研究,而梁启超作《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将伪书分为十类,则属于文献学的内容。具体到汉文佛教文献,如《中华大藏经》以赵城金藏为主要底本,以多种藏经为校本,对佛经进行的校勘工作,即为佛教文献整理,其结果是产生了大量的校勘记;而佛教文献学研究则是以此为基础进行整理和提高,即以这些校勘记为研究对象,分析佛教文献校勘的特点、规律,佛经校勘与世俗经典的校勘有何异同,佛经校勘有哪些方法,这些方法如何用于下一次的佛教文献研究与整理中,等等。

## 二、建立汉文佛教文献学的可能性、必要性

以上对汉文佛教文献、汉文佛教文献群以及汉文佛教文献学作了初步的界定,然则,建立汉文佛教文献学有无必要?是否可能?

### (一) 建立汉文佛教文献学的可能性

黄永年先生讨论古籍版本学时曾言:“所谓‘学’者,顾名思义应该是一门科学,而任何一门科学,都必须是在大量有代表性的事实或现象的基础上,提炼出规律性的东西,从而建立比较完整的体系。”<sup>[3]2</sup>任何一种研究若想成为一门学科,至少应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研究对象足够大,如果研究对象过小,则学科无法深入发展;二是相关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如果研究成果太少,则无法总结归纳具有普适性之规律。

#### 1. 汉文佛教文献足够广大

汉文佛教文献现存有多少典籍,目前为止虽无一权威、严密与科学的统计,然而从相关学者的论述中却可略窥端倪。蓝吉富先生言:“如果把现存大藏经中的中国人注疏与著作加起来,以字数计,大约有两亿字左右。这个数目是所译佛典的三倍有余。”<sup>[4]24</sup>方广锬先生言:“除了传统的以‘佛说’的面貌出现的经典外,由后代僧人、居士编纂的各种注疏与论著数目更加惊人。据我粗略估计,仅汉文佛教典籍,总数大约在4.5亿字左右。”<sup>[5]9</sup>据张新鹰先生之说,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华大藏经·正编》正编字数为1亿,而将要编辑的《中华大藏经·续编》的字数当在2.6亿左右<sup>[6]</sup>,两者相加,所收汉文佛教典籍约3.6亿字。蓝吉富先生所说的2亿字,仅指撰述类汉文佛教典籍,而方广锬、张新鹰二先生所言则包括翻译类佛教典籍。由此看来,中国汉文佛教典籍文字数量当在4亿字左右。而这些尚不包括日、韩等汉文化圈中其他国家僧俗所翻译与撰述的汉文佛教文献,也不

<sup>①</sup> 蓝吉富《佛教史科学》序言云:“十几年来,笔者所开的课,从‘佛典目录学’,而调整为‘佛教文献学’,近几年则改为‘佛教史科学’,这种递嬗调整的考量依据,主要是在佛教研究的实用性。”此正可说明佛教史科学更强调其实用性和为相关学科的服务性。参见蓝吉富《佛教史科学》,(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2页。

包括近代佛教期刊等汉文佛教文献<sup>①</sup>。这一庞大的文献群无疑为建立汉文佛教文献学提供了足够广大的研究对象。

## 2. 汉文佛教文献的整理、研究已有相当丰富之成果

汉文佛教文献学虽然刚刚起步,但对汉文佛教文献的整理、研究却古已有之,源远流长。历代僧俗在这一方面已做了大量工作:如僧祐、费长房、法经、彦琮、道宣、靖迈、明佺、智升等人对汉文佛教文献之编目,惟白、王古、寂晓、智旭、王昶等人对大藏经之解题,历代祖师大德对佛教经典的注释,历代汉文大藏经的编修刊行,皆是对汉文佛教文献之整理。而近代以来,由于敦煌佛教文献和古逸藏经之发现,佛教文献研究可谓如日中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举其大者:

汉文佛教文献辨伪方面:有章太炎、梁启超、胡适、汤用彤、欧阳渐、周叔迦、余嘉锡、王恩洋、唐大圆、吕澂、印顺等对《牟子理惑论》、《楞严经》、《四十二章经》、《大乘起信论》等经典真伪的勘辨。

汉文佛教目录方面:有梁启超、姚名达、陈垣、冯承均、周叔迦、吕澂、金克木、苏晋仁、童玮、蔡念生、白化文、罗炤、李富华、蓝吉富、方广锜、谭世保、陈士强、徐建华等人对佛教目录的整理与研究。

汉文佛教版本方面:对大藏经版本的研究有梅光羲、叶恭绰、蒋唯心、周叔迦、蔡念生、陈豪楚、宿白、李富华、方广锜、蓝吉富、张新鹰、李际宁、何梅等人。而对单刻本汉文佛经的研究则有戴蕃豫先生的《中国佛典刊刻源流考》与日人椎名宏雄的《宋元版禅籍の研究》。

汉文佛教文献的校勘方面:普慧藏、大正藏、中华大藏经都用多种藏经版本进行了对校。如《中华大藏经》以赵城金藏、房山石经、碛砂藏、南藏、嘉兴藏、清龙藏、高丽藏等八种藏经进行互相比勘。而《大正藏》也以资福藏、普宁藏、嘉兴藏、高丽藏、缩刷藏等进行校勘。

汉文佛教文献的综合校理方面:这一方面的突出代表为中华书局刊行的《中国佛教典籍选刊》,已出版《坛经》、《高僧传》、《宋高僧传》、《出三藏记集》、《五灯会元》、《华严金狮子章》、《古尊宿语录》、《三论玄义》、《大乘起信论》、《成唯识论》、《童蒙止观》、《比丘尼传》等。其中如《高僧传》、《出三藏记集》等书的点校整理,相当精审。而中华书局出版由石峻、楼宇烈、方立天等合编的《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四卷十册,也为汉文佛教文献综合校理的重要成果之一。

汉文佛教文献整理研究的丰富成果无疑为建立汉文佛教文献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二) 建立汉文佛教文献学的必要性

当今世界主要有三大佛教文献群,即南传巴利语文献群、藏文文献群与汉文文献群,其中,汉文佛教文献群典籍数量最大、所历时间最久,若欲全面、深入了解佛教佛学,特别是大乘佛教之开展,必须对汉文佛教文献进行深入研究。近来,汉文佛教文献的研究已引起国内外佛教研究学界和古文献研究学界的广泛重视<sup>②</sup>。

汉文佛教文献在长期发展和演变过程中,渐次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也产生了与其他文献不同的问题。此种问题既非欧美佛教文献学所可解决,又与中国传统世俗文献学有诸多之不同,职是之故,为进一步促进汉文佛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建立与汉文佛教文献特点相适应的具有独特概念、范畴和理论的汉文佛教文献学就显得非常必要。

<sup>①</sup> 近代佛教期刊数量相当庞大,黄夏年先生所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就有208巨册。

<sup>②</sup> 2004年11月,“中国宗教文献研究国际研讨会”在日本京都召开;2006年11月,华中师范大学召开了“首届佛教文献与中国古代文学研讨会”。如果说前者代表了佛教学界对佛教文献的重视的话,那么后者则表明古文献学界对汉文佛教文献研究的青睐。

### 1. 欧美佛教文献学方法的不适应性

近代欧美佛教研究一定程度可以说是在整理梵、巴等佛教文献的基础上衍生、开展出来的,因此,以多种语言比较对勘来处理佛教文献几成欧美学界研究佛教最为正统与权威的方法。这种在以《圣经》研究传统为基础的西方古典文献学和大航海时代以后诞生的比较语言学两股潮流推动下产生的研治佛典的方法,在印度佛教研究以及阐明佛教在不同文化圈中的不同形态方面,贡献卓著,其所取得的成就世人皆知。

然而此种方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有其潜在的问题。日本学者下田正弘评论欧美佛教文献方法时说:“譬如,我们观察日本学术界的状况,在以梵文为中心推进的研究背后,出现了轻视以古代汉文为基础进行研究的不良倾向,结果使研究流于形式。这种状况一旦超过限度,就会使研究者的兴趣发生偏颇,最终导致研究工作扭曲。如果我们真的要阐明佛教的史实,仅仅使用梵文和巴利文恐怕是不够的。尤其是对了解早期大乘佛教而言,必须搞清楚安世高、支娄迦谶、竺法护等人翻译成汉文的佛教经典。我们既要导入西方的古典文献研究的缜密方法,而且(笔者按:疑当为‘切’)不可被他们使用的素材搞花了眼睛。”<sup>[7]148</sup>

笔者在此无意对欧美佛教文献研究方法进行评论,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这种在研究佛教原典和印度佛教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方法在处理汉文佛教文献时的不适用性。

研究对象决定研究方法,不同的研究对象应有不同的研究方法。欧美佛教文献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印度佛教经典,所采用的方法是通过比较语言学的分析而上溯哲学观念,以还原佛典思想的原始脉络和意义。其支撑条件是比较语言学,其前提条件是同一经典有不同语言的版本。汉文佛教文献由两部分组成,即翻译类汉文佛教文献与撰述类汉文佛教文献,而由中土僧俗人士撰写的注疏、目录、音义、史传等撰述类佛教文献的数量大约相当于翻译类汉文佛教文献的三倍。这一庞大的撰述类汉文佛教文献群并没有不同语言的版本可资比较,所以如果说欧美佛教文献的方法对汉译经、律、论的研究尚能展开的话,对于中、日、韩三国佛教徒著述的研究实际上是不适应的。这一点也可以从欧美研究禅宗的方法得到印证,与19世纪佛教研究不同,欧美的禅学研究并没有沿用其在文献学方面的成就,而是采用了一种文化诠释的方法。原因之一是禅宗的文献仅有汉文一种版本,比较语言学的方法不适合处理这种单一语言的佛教文献。

既然欧美佛教文献学的研究方法无法处理这庞大的汉文佛教撰述类文献,那么要对这批文献进行深入研究,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汉文佛教文献学就显得相当重要和急迫。

### 2. 汉文佛教文献学与世俗文献学有诸多不同

既然欧美佛教文献学的方法不能适应汉文佛教文献,那么是否可以直接运用中国传统世俗文献学的方法来处理汉文佛教文献呢?世俗文献学的方法虽然是建立汉文佛教文献学的重要借鉴,但由于世俗文献学与佛教文献学存在着诸多不同,这决定了我们并不能直接用中国传统世俗文献学的方法来处理汉文佛教文献。

(1) 汉文佛教目录与外典目录有很大的不同。第一,从产生上来说,外典目录产生于文献的编目整理,故而极重分类,类例既分,则学术自明;而内典目录则产生于对翻译经典的记载,故而最重辨伪。第二,外典目录反对“以人类书”,即一般不根据作者对图书进行分类;而内典目录,特别是其中的“代录”,常以时间为序,根据译者对经典进行分类。第三,外典目录较少重视检索功能,一定程度是学者的目录学而不是读者的目录学;而内典目录自唐开始便有各种各样之编号,以供检索之用,读者目录学的特点更为明显一些。

(2) 汉文佛教文献版本与世俗文献的版本有很大不同。如世俗文献版本的差异主要在于抄写与雕印的不同;而汉文佛教翻译文献版本的差异还表现在原本的不同、异译本的不同等方面<sup>[4]410-422</sup>。汉文撰述类文献,特别是禅宗语录类文献,其版本间的差异不仅表现在抄写与雕印方

面,还表现在文献的产生方式、记录方式上。如笔者曾整理过明代雪关智闇的语录,其语录即有13卷本的《雪关禅师语录》,又有6卷本的《雪关和尚语录》,由不同人记录,有广略的差异。再如与功德、供养思想相联系,汉文佛教文献出现了许多独特的版本现象,比如血经、绣经<sup>①</sup>、填墨写经,甚至陶版经等<sup>②</sup>,这些都是世俗版本学中没有或较少遇到的问题,而在汉文佛教版本学中则成为经常遇到或比较重要的问题。

(3) 汉文佛教文献的校勘和辨伪也与世俗文献学存在差异。与汉文佛教文献版本的特殊性紧密相关的是汉文佛教文献校勘的特殊性。世俗文献的校勘主要针对的是同一文献的不同的刻本与印本,而如上文所述,汉文佛教文献版本的差异不仅在于雕印的不同,还存在着在不同原本、同本异译等版本问题,因此,汉文佛典的校勘相对比较复杂。如同本异译是否可以互相作为校勘的材料<sup>③</sup>? 用佛典的摘抄本校勘其原本应怎样操作? 操作过程中应注意哪些问题<sup>④</sup>? 禅宗语录的广本和略本应作为不同的文献,还是作为同一文献的不同版本? 它们之间是否可以互相对勘? 这些问题都是世俗文献校勘中不曾遇到或较少遇到的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积累经验、归纳类例、探求规律。佛经的辨伪虽与世俗文献有许多相似之处,然亦有其特异之点: 如世俗文献的辨伪,尽管其辨伪方法有科学与不科学、严密与不严密之分,研究者所持的态度则是实事求是的;而佛教首先是一种信仰,故佛经的辨伪常与宗教情感纠结在一起,特别是教内学者的研究,一般为“结论后之研究”,研究的宗教立场对佛教文献的辨伪产生了重要影响,一定程度上左右了研究的客观性。关于此一现象,我们可从近代“大乘非佛说”的讨论以及对《楞严经》、《大乘起信论》等真伪勘辨中清楚地看出。

中国传统文献学与汉文佛教文献学处理的对象都是汉文典籍,这决定了两者有很多相似性,建立汉文佛教文献学需要从中国传统文献学中吸收有益的成分。然而,两者处理的对象毕竟各有侧重,各有特点,中国传统文献学并不能代替汉文佛教文献学。

### 3. 汉文佛教文献在整个中国文献学史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汉文佛教文献在中国文献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也是建立汉文佛教文献学的一个重要原因。

(1) 多种目录类型由佛教学者首创。比如导学目录,王重民先生认为唐末敦煌卷子《杂钞》为最早之导学书目<sup>[8]131-133</sup>,而唐麟德元年(664)道宣著《大唐内典录》专设《历代众经举要转读录》一部,实为最早之导读目录。再如流通目录,学界认为明嘉靖元年(1522)金台汪谅刻《文选注》书后所附金台书铺所刻书目为最早的流通目录<sup>[9]290-291</sup>,然此目并未标明书籍价格。而明万历年间,嘉兴藏经局所编《经值画一》,于每经之下皆注明银钱多少,实为更为完备之流通目录。而辑录体目录,如朱彝尊《经义考》导源于僧祐《出三藏记集》久已为前贤所揭出<sup>[10]346</sup>。

(2) 佛教在中国版本学、印刷术等方面贡献卓著。如王子舟先生认为最早的版本概念即导源于佛经之译传,《出三藏记集》中就已出现“梵本”“异出本”“正本”“真本”等概念<sup>[11]89-90</sup>。而佛教对中国印刷术发展之推动作用更是有目共睹: 现存早期的雕版印刷品多为汉文佛教经典,而最早的插图本、最早的朱墨双色套印本皆为汉译《金刚经》<sup>[12]</sup>。中国最早的丛书为宋代汉文大藏经开宝藏,而在中国古代影响甚大、流行极广的千字编号亦为佛徒所创<sup>[13]477-513</sup>。

李际宁先生评论佛教对中国文献学所作贡献时说:“在早期印刷术方面,佛教的作用,几乎达到

① 志磐《佛祖统纪》卷二八《往生女伦传》载:朱如一“绣《法华经》一部,十年而成”。《善女人传》卷二载湖州唐氏“乃绣《金刚经》一部,阅二年始完,精巧密致,点画厘然”。真可《紫柏尊者全集》卷一五载有《宋绣〈观音经〉跋》。

② 韩国通度寺瑞云庵性坂法师将高丽藏烧制为“十六万陶瓷大藏经”。参见葛兆光《通度寺瑞云庵看大藏经陶瓷版》,载《在异乡听雨看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

③ 在这一问题上,已有学者进行了初步的尝试。如陈祥明《略论异译经在佛典校勘方面的作用——以〈起世经〉及其异译为例》,载《泰山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第75-79页。

④ 如普慧藏《景德传灯录》即用宋王随《景德传灯录》抄本《传灯玉英集》来对《景德传灯录》进行校勘。

了无可比拟的地步。又比如书籍的装帧形态、文献目录学、大型丛书的组织编纂等方面,中国佛教都起到了重要作用。”<sup>[14]</sup>凡此种种,皆说明佛教文献学在整个中国文献学中的地位,故建立汉文佛教文献学不仅关乎汉文佛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对中国文献学的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参 考 文 献]

- [1] 方广钊:《佛教研究40年综述》,见世界宗教研究所编《宗教研究四十年》,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59-71页。[Fang Guangchao, "The Summary of Buddhism Studies in Forty Years," in Institute of World Religions(ed.), *The Studies on the Religions in Forty Years*, Beijing: Religion Cul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4, pp.59-71.]
- [2] 冯国栋:《汉文佛教文献学体系构想》,《世界宗教研究》2009年第2期,第55-64页。[Feng Guodong, "On the Idea of the System of the Study of Chinese Buddhist Literature," *Studies in World Religions*, No.2 (2009), pp.55-64.]
- [3] 黄永年:《古籍版本学》,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Huang Yongnian, *The Study on the Edition of Ancient Books*, Nanjing: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5.]
- [4] 蓝吉富:《听雨僧庐佛学杂集》,台北:现代禅出版社,2003年。[Lan Jifu, *Buddhism Studies Collection of Tingyusenglü*, Taipei: Modern Zen Publishing House, 2003.]
- [5] 方广钊:《怎样读佛经——佛教研究经验谈之一》,《世界宗教文化》2001年第2期,第9-10页。[Fang Guangchao, "How to Read the Sutras: One of Buddhism Research Experience," *The Religions Cultures in the World*, No.2(2001), pp.9-10.]
- [6] 张新鹰:《〈中华大藏经〉——一项重大的佛教文化工程》,《中国民族报》2006年6月27日,第6版。[Zhang Xinying, "Zhonghua Dazangjing: A Significant Project of Buddhism Culture," *Chinese Nationality Newspaper*, 2006-06-27, p.6.]
- [7] [日]下田正弘:《佛教研究的现状与课题——以佛陀观的变迁为例证》,《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第2期,第147-150页。[Xiatian Zhenghong,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the Topic of Buddhism Studies: Taking the Vicissitude of Buddha View as Illustration," *Studies in World Religions*, No.2(2000), pp.147-150.]
- [8] 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Wang Zhongmin, *The Collection of Chinese Catalogue Histor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4.]
- [9] 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目录编》,济南:齐鲁书社,2001年。[Cheng Qianfan & Xu Youfu, *Jiaochou Guangyi*, Jinan: Qilu Press, 2001.]
- [10] 梁启超:《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见《佛学研究十八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34-360页。[Liang Qichao, "The Position of Buddhism Catalogue in Chinese Catalogue," in *18 Papers on Buddhism Studies*,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1, pp.334-360.]
- [11] 王子舟:《梵本考述》,《图书馆学研究》1988年第4期,第89-92页。[Wang Zizhou, "Studies on the Sutras in the Indian Language," *Researches in Library Science*, No.4(1988), pp.89-92.]
- [12] 沈津:《关于中国现存最早的元刻朱墨套印本〈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图书馆杂志》2002年第11期,第77-78页。[Shen Jin, "About the Chinese Extant Earliest Block-Printed, Red Ink Chromatography in Yuan Danasty: Vajrachhedika-Prajnaparamita-Sutra," *Library Journal*, No.11(2002), pp.77-78.]
- [13] 方广钊:《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Fang Guangchao, *Studies on the Dazangjing in Chinese Manuscript*,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6.]
- [14] 李际宁:《佛经版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Li Jining, *The Edition of the Sutras*, Nanjing: Jiangsu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2.]